

银雀山汉墓竹简

孫臏兵法

981

80

孫臏兵法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文物出版社

1975年 北京

孙 臆 兵 法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185号

一二〇一印刷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75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开 印张：5¹/₄

统一书号：7068·339 定价：0.45元

目 录

《孙臆兵法》初探(代前言)·····	詹立波 (1)
孙臆兵法(释文及简注)	
上编·····	(31)
下编·····	(83)
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	山东省博物馆 临沂文物组 (125)
从银雀山竹筒看秦始皇焚书·····	卫 今 (143)
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节录·····	(152)

《孙臆兵法》初探

詹立波

战国中期著名军事家孙臆的《孙臆兵法》，和春秋末年杰出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一样，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很受推崇的法家军事著作。但《孙臆兵法》以后失传，《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因此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孙武和孙臆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问题，存在着种种争论。一九七二年四月，《孙臆兵法》在失传了一千余年之后，从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墓葬中，与《孙子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同时发现了，从而顺利地解决了上述悬案。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儒法斗争，特别是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胜利。

孙臆，战国时齐人，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其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商鞅、孟轲同时期。他曾与庞涓一起学习过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自以为能不及

孙臆”，秘密召孙臆至魏，借故施以臆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以后，孙臆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齐将田忌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孙臆任军师期间，辅助齐将田忌打了一些胜仗，最著名的是公元前三五三年的齐、魏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之战，孙臆用“批亢捣虚”、“疾走大梁（魏都，今河南开封）”、“攻其必救”的战法，大破魏军，活捉了庞涓^①，解除了魏军对赵都邯郸的围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曾提到这一战法，并把它作为反围攻作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毛主席指出：“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孙臆所处的战国中期，正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在中原各诸侯国基

① 根据竹简《孙臆兵法·擒庞涓》所记，庞涓于桂陵之战被擒。而《史记》中，《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和《孙子吴起列传》等，在记述公元前三五三年的桂陵之战时，没有提及庞涓；而在记述公元前三四一年的马陵之战时，称庞涓被杀或自杀，魏太子申被虏。竹简与《史记》所记不同。

本上掌握了政权，较普遍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而且相互间频繁地进行着客观上有利于封建统一的兼并战争。但是，各诸侯国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因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上层建筑领域内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十分激烈。在军事思想上，法家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提倡富国强兵的“耕战”政策，主张用革命暴力扫除奴隶主残余势力和诸侯封建割据势力，用战争手段实现全国统一。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就响亮地提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而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则拚命反对法家的“耕战”政策，到处兜售“法先王”、“施仁政”、“以德服人”的儒家路线，把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封建统一战争诬蔑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公开叫嚷“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朱熹在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善战，如孙臆、吴起之徒”（《四书集注》）。显然，孙臆是孟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直接对立面之一；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战国中期儒法两家激烈论争的一个重要侧面。

孙臆所在的齐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封建制的出现比较早。到齐威王时，继续革新政治、经济，“谨修法律而督奸吏”，以致“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孙臆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

边，为齐威王所重用。他辅助齐王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司马迁说：“齐威王、宣王用孙子（臧）、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政治、经济的改革，以及频繁战争，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和推动着军事思想的发展，《孙臧兵法》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臧兵法》有八十九篇，图四卷。现整理出版的《孙臧兵法》，共三十篇，一万一千余字。由于出土的竹简严重残缺，难以看出原书的全貌，其中是否部分掺杂有其它失传兵书的章句，尚难断定。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等早期法家兵书的军事思想，总结和吸收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反映了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和对待文化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等教导，本文拟就《孙臧兵法》对战争的态度、作战指导、治军和哲学思想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孙臧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明确主张“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朴素地提出了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思想。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因此，如何认识和对待战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孙臆站在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到了要巩固和发展封建制，使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政权能够“强”起来和“立”得住，必须使用战争手段。齐国在田氏代姜时，对奴隶主旧贵族实行过种种妥协，改革并不彻底。到齐威王时，奴隶主残余势力仍严重地存在着，魏、楚等封建强国又威胁于外，因此齐国虽号称强盛，但复辟与反复辟、割据与统一的斗争，仍为新兴地主阶级所面临的头等大事。这些，就是孙臆提出“举兵绳之”、以兵“禁争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等主张的历史背景。

孙臆为了驳斥儒家以“仁义”去战、反对进步战争的反动说教，他引用儒家所推崇的古代所谓“五帝”、“三王”用兵攻取的历史故事，说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欲责(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连所谓“圣人”都必须使用战争手段，才能统一天下，维持其统治，处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战国时代，还要用什么“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一套奴隶制的“礼”，“以禁争夺”，

自然更是荒谬的。孙臆的这一论述，对儒家所宣扬的“黄帝尧舜垂衣裳（不用战争）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以及什么“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孟子·离娄上》）、“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下》）等等谬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孙臆在肯定战争不可避免的同时，主张对战争持慎重态度。他指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这里讲的“在亡国而继绝世”，与孔丘为复辟奴隶制而鼓吹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纲领是根本不同的。孙臆是说，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打胜了，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打败了，则要削地甚至亡国，因而务必慎重。这同孙武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基本涵义是相同的。孙臆和孙武一样，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因此深知战争的利害关系。

孙臆主张慎战，强调“事备而后动”，就是说，战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反之，“用兵无备者伤”，非但达不到“战胜而强立”的目的，还可能危及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即“削地而危社稷也”。怎样才算“事备”呢？孙臆认为：除了“见福祸于

未形”，预见到战争的利害得失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他说：“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所谓“有委”，就是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在《强兵》中，孙臆明确指出了“强兵”和“富国”的关系，强调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也”。所谓“有义”，就是要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政治上站得住脚。具备了这一条，兵虽少，也会坚强有力。当然，“义”是有阶级性的，孙臆所说的“义”，是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战争所具备的正义性。这同孟轲之流儒家所鼓吹的为复辟奴隶制的“仁师”、“义战”本质上是不同的。

孙臆在战争问题上另一个有价值的思想，是强调指导战争的人（所谓“王者之将”）必须知“道”，即要懂得战争的规律。他说：“夫安万乘国（大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静），此王者之将也。”又说：“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在《孙臆兵法》残简中，提到“道”的地方有数十处之多。综观其内容，约略可分为论述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两大类。而上面这段话，显然指的是要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除上面这段较完整的论述外，散见于各篇的有关“道”的论述还不少。在《威王问》、《陈忌

问垒》、《八阵》、《十问》、《十阵》等篇中，也多次论述到在不同的地形、敌情条件下如何运用不同的阵法战法的问题，并且强调“料敌计险，必察远近”，是为“将之道”。此外孙臆还提出了“恒胜有五”和“恒不胜有五”的论断。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将帅有指挥全权），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恒不胜有五：御将（君主干预将在前线的作战行动），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将帅不和），不胜。不用间（间谍），不胜。不得众，不胜。”孙臆这些对战争胜败客观规律的认识，朴素地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唯物的军事思想。它同孔孟之流鼓吹的“仁者无敌”、“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等唯心主义的反动说教，完全是针锋相对的。

（二）

《孙臆兵法》残简中占篇幅最多而且内容最为丰富的，要算是关于作战指导方面的论述。尤其是其中“以寡击众”、“必攻不守”、“势备”、“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等思想，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认为寡可胜众，弱可胜强

孙臆在同齐威王、田忌的问对中，明确地提到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强的地方不下十数处之多，如：“敌众

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以一击十，有道乎？”等等。孙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的战法，如：“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不同敌人硬拼；“埤(卑)垒广志(筑低垒表示无所畏惧，以激励士气)，严正辑众(严明法令，团结士卒)，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告之不敢，示之不能(故意示弱)”，“以骄其意，以惰其志(使敌懈怠)”；“营而离之(迷惑和分散敌人)，我并卒而击之(厚集兵力以打击敌人)”，等等。孙臆特别强调，要做到以寡胜众、以弱胜强，关键在于集中自己兵力，分散和牵制敌军。认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兵力虽如镒铢(古衡名，六铢为镒，二十四铢为两)之少，也显得有余；如果“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于敌也显得不足。

孙臆这种敢于战胜强敌、众敌的作战指导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图强的精神和要求实现封建统一的愿望。在“诸侯力政，争相并”(《史记·秦本纪》)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臆等法家人物意识到：只有敢于斗争，不畏强敌、众敌，才能“战胜而强立”，进而实现封建统一。显然，这正是当时法家进步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

而以孟轲为代表的梦想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统一的事业则极端仇视。他们鼓吹“小

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上》）、“敌（同等）国不相征也”等等谬论，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是，实现封建统一，是战国中后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孟轲之流如何咒骂统一战争，最终还是由封建改革比较彻底的秦国实现了这种统一。

强调进攻战略，“必攻不守”

孙臆强调进攻战略、“必攻不守”的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和田忌的一段问对中。齐将田忌问孙臆说：“赏罚者，兵之急（最紧要）者耶？”孙臆说：“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整饬纪律），令民（卒）畏上也。可以益胜（增加胜利条件），非其急者也。”田忌又问：“权、势、谋、诈，兵之急者耶？”孙臆说：“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统军）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地说：“此六者，皆善者（善于用兵的人）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也？”孙臆回答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田忌提出的六个问题，都是当时的用兵要务，但孙臆却认为只能算作“益胜”的条件，而“必攻不守”才是最关紧要的。显然，这里指的是战略而不是指的具体

作战行动。从上述对话的整个意思以及历史背景来看，可以认为，孙臆所指的“必攻不守”是主张采取以进攻为主的战略。这一主张，实为先秦法家重要军事思想之一。如：孙武就很强调进攻。商鞅也说：“负海之国，贵攻战。”（《商君书·兵守》）齐国即“负海之国”，当时正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齐威王当政时期，“齐国大治”，以致诸侯“莫敢致兵于齐”，“楚人不敢为寇东取”，“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这种情况下，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其统治的要求，就成为必然的了。孙臆“必攻不守”的主张，正是为了适应齐国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客观上，它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要求统一的趋势，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

古人说：“孙臆贵势”。孙臆十分注意利用和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的问题。《孙臆兵法》讲到“势”的地方很多，并有一篇叫做《势备》，着重论述了“势”。

孙臆朴素地看到了事物是可以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认为“势”是可以创造的。他认为战争形势的有利和不利，就象天下万物的有生有死、有能有不能一样，是永

远存在着的客观事实。他说：“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生物)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指挥战争的人们，应“便势利地”，因势利导，掌握战争主动权，争取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使自己的军队饱食而待敌之饥，安处以待敌之劳，正静以待敌之动，使敌人“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分离而不相救”，“受敌而不相知”，“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甲坚兵利不得以为强，士有勇力不得以卫其将”，完全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

怎样才能创造这种有利的作战态势，达到作战指挥上的“便势利地”呢？《孙臆兵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办法。他主张要：“料敌计险”(估料敌之行动，察计地形的险易)；“敦三军(使全军和睦统一)，利屈伸(便于进退)”；“分人之兵”，“按人之兵”(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兵力)；根据不同的地形，“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两旁高峻而且狭窄的地方)则多其弩”，做到“居生击死”(自己占据有利地形，打击居于不利地形的敌人)；“进不可迎于前，退不可绝于后，左右不可陷于阻”，以便使自己军队“四路(进、退、左、右)必彻(通达)，五动必工(自如)”，使敌军陷于“四路必穷，五动必忧”的困难境地等等。

孙臆强调“势”，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思想，并不

是他的独见，而为历来军事家所重视。但是，论述得如此系统，并且从事物的“生”、“死”变化原理出发提出造势的可能性及一系列具体办法，这在古代军事家中还是少见的。

“胜不可一”，强调灵活运用战法

孙臆认为，在战争中没有经常有利的形势可以利用（“夫兵者，非士（恃）恒势也”），也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办法去对付各种各样的敌人（“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因此，他强调“料敌计险”，“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就是说，将在作战中要不断具体地分析敌情、地形，根据不同的敌情和地形采用不同的战法。

孙臆在《十问》、《十阵》等篇中，对灵活运用战法问题作了许多具体的论述，举其要者，如：对于“众且武”的强敌，取胜战法是“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对于势均力敌、顽抗坚守之敌，则“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对于凭坚固守之敌，要“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离开险要地形和工事），以揆其虑（揣度其行动意图），施伏设援（设伏诱敌），击其移庶（乘敌人正处在移动时予以打击）”；对于将勇兵强，又有众多兵力之敌，则应“告之不敢，示之不能，坐拙而待之（故意示弱迷惑敌人，谨慎以待，